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儒林外史的

文化意蕴

李汉秋 著
孙静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

李汉秋 著 孙静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

李汉秋 著

孙 静 审定

责任编辑 余 峤

大象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邮码 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4.5 印张 86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325 册

ISBN 7-5347-2027-3/Z·72

定 价 5.55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袁行霈 吴同瑞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宏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

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的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	创作道路和构思	1
	(一)吴敬梓的创作道路	1
	(二)《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思	8
二	八股陋儒	10
三	假儒、迂儒与真儒	24
	(一)道德沦丧的官绅——假儒	24
	(二)理学扭曲的君子——迂儒	35
	(三)倡行礼乐的贤人——真儒	38
四	假名士与真名士	53
	(一)形形色色假名士	56
	(二)奇人异行真名士	66
五	杰出的讽刺艺术	78
	(一)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79
	(二)笑的多重奏	87
六	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	99
	(一)寄寓性讽刺溯源	101
	(二)现实性讽刺溯源	105
	(三)开创讽刺小说	109

(四)深远的影响	114
七 近代现实主义的曙光	118
(一)从传奇性到现实性——小说 进一步接近现实人生	119
(二)从故事小说型到性格小说型 ——小说艺术发展到更高层次	121
(三)从古典典型形态到近代典型 形态——小说人物更切近人的 真实面貌	124
(四)从说书人的评述模式到隐身 人的叙述方式——小说形象 更贴近读者	129
(五)从相沿加工到作家独创—— 小说作者的个性空前加强	133

— 创作道路和构思

(一) 吴敬梓的创作道路

清代前期，诗坛上有“南施北宋”（“南施”指江南宣城人施闰章、“北宋”指山东莱阳人宋琬），剧坛上有“南洪北孔”（“南洪”指《长生殿》的作者浙江钱塘人洪升、“北孔”指《桃花扇》的作者山东曲阜人孔尚任），继他们之后，小说领域出现的《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的作者吴敬梓和曹雪芹，一个生活在皖、苏，一个主要生活在北京，似乎可以称为“南吴北曹”，两人共同把我国古典长篇小说推上了最高峰。

吴敬梓的传记资料要比曹雪芹的翔实丰富得多，无需为考据生卒年和主要经历而大费周折。他的好朋友程晋芳在

他逝后不久就写了《文木先生传》，他的亲属与好友，对他的行状和思想性格都有真切的记述。

吴敬梓(公元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安徽全椒人，出身于大官僚地主家庭，祖辈显达，家门鼎盛。父亲吴霖起(或说是嗣父)去世后，家势日趋衰落。54岁时，结束了穷愁潦倒的一生。他留下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和集外三十余篇佚诗佚文。已佚的有《诗说》、二十卷本《文木山房集》和尚未成书的《史汉纪疑》。

吴敬梓的道路是封建叛逆者的道路。23岁那年，父吴霖起逝世，他的生活面临一个转折，从此明显地跨上叛逆的程途。方正不阿的吴霖起为恶浊的封建官场所不容，在苏北赣榆县度过八年苜蓿生涯，终不免被罢官，带着22岁的吴敬梓回到故乡，抑郁而死。这使青年吴敬梓初步体会到，在当时社会里，“守规矩与绳墨，实方圆而枘凿”^①，正直知识分子是难有出路的。此后他独担门户，种种矛盾丛集一身。首先是遭逢“家难”——族人欺他两代单传，蓄意侵夺祖遗财产。从此，他从近亲身上发现了地主阶级贪婪残暴的本性，看出了宗法家庭的黑暗、封建道德的沦丧、人情世态的炎凉。年轻人单纯而和谐的精神状态被打破了，不满和愤慨采取极端的形态表现出来：你们视财如命，我就挥金如土；你们虚伪狡诈，我就任达放诞。表面看来这时的吴敬梓一派纨绔习气，骨子里却另有蕴含。吴槩贺他三十初度的诗说得

① 《文木山房集》卷一《移家赋》，见李汉秋《吴敬梓吴焘诗文合集》，本书所引吴敬梓诗文均见此书。

很清楚：吴敬梓原先是“少年志卓犖，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何时发生转变呢？——“浮云转眼桑成海，广文（按：指吴霖起）身后何啻含！他人入室考钟鼓，怪鸱恶声封狼贪！”吴霖起死后，他直面怪鸱和封狼，由愤世嫉俗激而为纵情悖礼，放浪不羁，于是“一朝愤激谋作达，左骥史纳（按：乐人）恣荒耽”。金两铭的和诗也说：“迩来愤激恣豪侈，千金一掷买醉酣”^①。这种“愤激”就是对丑恶现实的强烈愤恨而激发出来的叛逆精神。此后几年，叛逆情绪随着接踵的不平事而日益增长，祖遗财产却随着叛逆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封建势力跟他的冲突就越来越尖锐。他被封建势力视作瘟疫的传染源加以防范排斥，但他决不妥协，33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决绝情怀，愤然离开故土，宣告了同封建家庭的决裂。在《儒林外史》的严贡生谋夺弟产、五河县势利熏心等篇章里，还可以看到他对县城里地主阶级头面人物的切齿痛恨。

从全椒移家南京，生活向他敞开了广阔的天地。他的叛逆思想也随着恣肆汪洋，向纵深发展。迁居南京以后，他的经济境况日益恶化、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他“田庐尽卖”，被肥马轻裘的年少耻笑，有时寻找机会“卖文”度日，有时只好忍痛拿了心爱的藏书去换米，或拿衣服去典当，到了典无可典卖无可卖的时候，就只有断炊挨饿。有一次秋霖三四日，姻亲程丽山叫人持米三斗、钱二千来看他，他已经断炊两天了！他在辞世前七天，在扬州遇到也趋破产的程晋芳，执手

① 吴繁、金渠、金两铭贺吴敬梓三十初度的诗均见金渠《泰然斋诗集》卷二。

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①话不多却情真语切，吐露了落拓者的悲苦辛酸。在由富贵跌落到贫困的逆境里，他备尝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对社会的不平、政教的黑暗，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也更多地体会到贫穷的苦痛，因而更能同情人民的疾苦，在生活和思想感情上接近了普通人民，所以《儒林外史》每以爱抚的笔触描写下层小人物，温煦之气直拂人面。

在叛逆的程途中，吴敬梓一直在追求理想，寻找理论武器。在南京、扬州一带，他广泛交接四方文士，与时代先进思潮的联系远比曹雪芹为密切。从他的思想和交游考察，他受顾炎武和颜（元）李（塋）学派的影响比较明显。清初进步思想家的理论和主张虽各不同，但几乎都异口同声地抨击八股科举，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反对宋明理学。其中颜李反程朱旗帜最鲜明，他们把程朱理学和八股科举联系在一起进行批判。这无异给吴敬梓提供理论武器，启迪他去揭露互为表里的八股和理学。颜李学派提倡礼乐兵农，主张培养博学而有实践能力的“通儒”，这也成为《儒林外史》提倡的正面理想。吴敬梓的好友程廷祚，就是颜李学派在南方的重要代表人物。公元1720年李塋南游金陵，程廷祚屡次从同学，当时理学家骂他们“共诋程朱”，视为异端。程晋芳《文本先生传》说吴敬梓“与余族祖绵庄（廷祚）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晚年亦好治经”，可见程廷祚对他的影响。

吴敬梓的世界观是复杂的，同时又是不断变化发展的。

^①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卷六《文本先生传》。

程晋芳说他晚年把治经当作“人生立命处”，其实他之治经，例如写《诗说》，并不自晚年始，在以经学包举社会科学的当时，他有意识地用治经对抗“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的八股颓风，用经学批判“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的宋明理学，所以他治经刻意要突破前人的窠臼，“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①，务要说出前人不曾说过的话，表现了探求真理的顽强努力。就像顾炎武和戴震等人一样，他也确实通过解经（如《诗说》）表现了一些民主主义的思想因素；但又像他前后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一样，他还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羁绊，正统儒家的礼乐仁政、文行出处等观念，甚至还被作为《儒林外史》的正面理想。对吴敬梓和《儒林外史》的儒家思想要做一分为二的细致分析，其中既有落后保守的成分，也还有积极合理的因素。

在社会地位下降、社会思想形成的同时，他的叛逆精神又进一步发展，解剖的刀刃由家族移向社会，考虑的范围由个人命运扩至民族前途，逐渐对朝廷功令、社会秩序、统治思想，日益抵触不满，乃至抗拒反对。这在出处的态度上集中地表现了出来。封建时代正直知识分子一向讲究操守，用《儒林外史》里的话说就是：“儒者爱身，遇高官而不受”。这就是重要的政治节操，能做官而不做，就意味着不与无道的当权者同流合污，就意味着对黑暗政治的不满和抵制。因此，出处的抉择是对现实政治根本态度的表现。在这方面，吴敬梓的抗拒态度是日益鲜明的。1736年他没有应荐到北

① 吴敬梓《尚书私学序》。

京参加博学鸿词科的廷试，其中虽有身体不适的客观原因，但联系他本人前后的行动和诗作来看，在思想上他是有辞征辟的主观原因的。还在移家南京之初，在《买陂塘》、《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寄李啸村》等诗词里，他就表示要像阮籍、嵇康那样借酒抗俗，隐于林下。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里表达“浮云富贵非所好，爱山成癖乐其真”的志趣，对“无端拟献金门赋”的行为有所悔悟。公元1737年他写了《酬青然兄》、《贫女行二首》，对膺荐进京应鸿博试的吴槃寓以微讽。又写《伤李秀才》诗，对同次膺荐赴考而死于京都的李岑森表示哀伤。在《美女篇》里，他庆幸自己没有像被荐入宫的富家女那样见嫉受困，而能够像汉皋神女那样保持着自由之躯。在《左伯桃墓》里，他批评“急荣遇”而离开朋友的墓主，自豪地说：“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从此，他索性连诸生籍也放弃掉，再也不参加乡试、科岁考等一切科举考试。顾云《盩山志》的吴敬梓小传记述当时有人责备他辞征辟，他回答说：“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补斯世耶否耶？与徒持词赋博一官，虽若枚马，曷足贵耶？”话说得很委婉，其实“生值明盛”云云，只是为避免惹祸而用的饰词，并非真话。《论语·泰伯》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若果“明盛”“有道”，岂能甘居贫贱藏而不用？这里所说出去无补于世，也就是《儒林外史》里杜少卿说的：“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就像庄绍光说的，在当时“我道不行”，因此拒绝与臧仓小人为伍，不愿充当御用文人去为统治者点缀升平。在这点上，金兆燕不愧是吴敬梓的知音，他概括这位前辈的风操说：“丈夫抱经术，进退触藩

抵,于世既不用,穷饿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颠倒肆诋欺!”^①他还记述:当公元1751年乾隆南巡举行征诏,许多人迎銮献诗的时候,吴敬梓却像卓诡不伦的东汉狂士向栩一样,企脚高卧,不予理睬^②。中年以后的吴敬梓不仅是以恣情任性的个人生活态度与封建世俗相牴牾,而且已经发展成为在政治态度上与统治者离心离德;不仅是自己家庭的叛逆者,而且已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者。他的忧愤更加深广了。他挥动如椽巨笔写作《儒林外史》,以严峻的笔调鞭答那些不讲操守、少廉寡耻、不择手段地去攫取名富贵的无耻之辈;热情地褒美讲究文行出处的贤人君子 and 嵒崎磊落的奇人豪杰。《儒林外史》的创作,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严峻批判和对理想境界的执着追求。

忧愤可以抑而为沉默郁闷,也可以激而为狂放纵恣,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魏晋风度,就是后一趋向的突出表现,吴敬梓景仰他们,仿效他们。他狂狷而豁达,以白眼睥睨群丑,以嬉笑轻蔑流俗。金兆燕送吴敬梓旅棹的诗说:“先生豁达人,哺糟而啜醪,小事聊糊涂,大度乃滑稽”,这样的气质和禀赋,正是《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艺术个性。

在愤世嫉俗中滋长着叛逆情绪,在穷困潦倒中接近了下层人民,在广泛交游中接受了进步思潮,又在进步思潮影

① 金兆燕《棕亭诗钞·甲戌仲冬送吴文木先生旅棹于扬州城外登舟归金陵》,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本书所引清代有关吴敬梓及其作品的资料,均见此书。

② 《棕亭诗钞·寄吴文木先生》。

响下发展着叛逆精神，种种因素交错渗透，相互推进，形成了吴敬梓的道路。这条道路反映了18世纪中国一部分优秀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不断前进的艰难历程。《儒林外史》既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也是反映他探索前进的一面镜子。

(二)《儒林外史》的总体构思

《儒林外史》涉及的社会面虽然很广，但正如鲁迅所说，“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中国小说史略》）。吴敬梓根据自己长期的体察和分析，描绘了一轴色彩斑斓的士林人物长卷，居于画卷中心位置的是形形色色的儒士和名士，可以称为封建末世士林百态的浮世绘。通过对一代文士生活和思想的现实主义描写，深刻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的严重危机，并探求疗救的出路。

如果说金钱资本是资产阶级围绕着旋转的轴心，那么，可以说，功名富贵是封建文士围绕着旋转的轴心。“功名”的概念在科举时代常用以指科第及由科第取得官职。“功名富贵”作为集合概念，它的核心是做官，有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就又贵又富。对待功名富贵的态度是对明清文士的试金石，也是烛照他们灵魂的最佳部位，由此烛幽索隐，足以使其灵魂最深处的纹理都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应当怎样对待功名富贵呢？作者正面提出的是“文行出处”。《儒林外史》就是以对待功名富贵和文行出处的态度为

中心，在深层建构起一个褒贬对比的结构框架，否定性人物与肯定性人物，陋儒、假儒、迂儒与真儒，假名士与真名士，分别分居对比结构的两侧，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把主题思想凸现出来。

儒士和名士纷然杂处，但各有自己的特征和文化渊源，为了便于这两个系统自己内部的对照，我们把他们分开来阐释，第二、三章分析儒士，第四章分析名士。

二 八股陋儒

儒士原指崇信儒家学说的知识分子。儒家是讲经世的，本书以儒士与名士对举，儒士指入世求仕的知识分子。

在褒贬对比结构的否定性人物一侧，吴敬梓首先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八股科举制度哺育的无智陋儒。

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和官吏，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对于选拔制度和政策，首先要看它服务于什么样的路线，其次要看它本身的合理程度，这一切都要从社会效果和影响进行检验。选拔和褒奖制度对于读书人士乃至整个社会的人心习尚，具有指示方向的作用。《儒林外史》首先着力从八股科举对儒士精神的毒害着手，解剖封建文化的这颗毒瘤。

察举（推荐）和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两种主要办法。